

5-14

戰爭與國家塑造—— 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

War and State-building: Wartime China, 1931-1945

楊維真（Yang Wei-chen）**

一、前言

自清中葉以來，西人藉船堅砲利以武力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傳統的天朝體制逐漸崩潰，轉而被迫進入以「國家」為核心的西方近代世界體系。從此，「世界國」的概念取代了原先的「天下國」，一個新型的國家觀念開始在中國形成。在外力的侵逼下，不論是為了解亡圖存，抑或是冀圖躋身強國之林，「舊中國」勢須歷經一番澈底改造，成為適應世界潮流的「新國家」，從而揭開中國「國家塑造」（state-building）的序幕。國家塑造一詞，係源於西方政治學之國家理論，泛指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後，國家權力集中化及制度理性化等過程。其後，隨著國家理論向社會、文化、歷史等領域滲透蔓延，相關學科乃援引國家塑造概念，從各個面向深入分析國家權力等議題，並有相當豐碩的成果。¹就歷史學而言，由於國家理論強調由歷史脈絡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關係，遂給予歷史學者很大的研究空間。²

西方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35-475 B.C.）曾謂：「戰爭乃一切事物之源頭」（War is the father of all

things）；在近代中國國家塑造過程中，「戰爭」無疑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對外戰爭。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曾對外進行多次戰爭，其對近代中國的形成影響甚大。但不論就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傷亡之慘重、影響之深遠，以及與國家塑造關係之密切言，1931至1945年的中日戰爭毋寧是最重要的，是以當前西方及臺灣學界對中國國家塑造主題的研究亦率多集中於此一時期。緣此，本文將就中日戰爭時期「戰爭與中國國家塑造」此一專題進行研究回顧，除論述此專題之學術背景及研究概況外，並將探討其研究觀點與未來展望。

二、國家與國家塑造

在政治學範疇中，「國家塑造」此一名詞其實並非新的課題。據學者指出，所謂國家塑造實有三重意義：一是釐清政府功能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次為專制國家的權力集中化；三為國家制度的理性化。³據此，早在近代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實已蘊含國家塑造之概念。19世紀下半葉，德國學者即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強調

* 本文初稿曾於2005年6月30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承張瑞德教授評論指正及與會諸先生惠賜寶貴意見，謹申謝忱。

**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 社會學者Michael Mann的著作堪稱最具代表性，參見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2 Charles Tilly即以歐洲歷史發展為背景，分析戰爭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參見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3 David Waldner, *State-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

「強權即公理」，主張以武力塑造一個新的國家。⁴ 此後，「國家」即成為政治學者研究政治文化及政治體系的重要分析概念，並主導了政治學的發展。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巨擘伊士頓（David Easton）受行為主義影響，於 1950 年代提出「政治系統論」，特別強調政治系統是社會系統之下的一個次級系統，並受到環境的影響，而政治系統最重要的功能即是處理來自環境的種種影響。⁵ 正惟如此，美國學術界開始將研究政治之焦點從傳統政治學向來所重視的「國家」，轉移至構成政治得以運作的「個人」，並將政治視為由一群個人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行動體系。由是國家角色降為次要，甚至視而不見，當日美國政治學者幾已揚棄國家此一觀念。

及至 1980 年代以降，美國政治學界開始重新掀起對「國家」概念的熱烈討論，國家再度回到政治學中。⁶ 學者認為此種轉變可能牽涉到四個根本的因素：1. 國家為人類社會具體存在之事實，其歷史發展與演變構成人類經驗的重要部分；2. 在群體生活中，國家的組織表現、統治角色，乃至於統治基礎，亦構成實存的政治經驗；3. 政治學者在尋求研究新領域、新理論時，重拾歐洲社會科學重視國家演變之傳統；4. 20 世紀後期政府角色持續擴大，機構利益亦日趨突顯，因之無法再漠視國家的存在。⁷ 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自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在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衝擊下，造成蘇聯解體、東歐鐵幕崩潰等一系列歐洲政治、社會的大變動。在此情形下，歐

洲新的國家突然大量湧現；再加上晚近歐盟的形成及發展，甚至更進一步的東擴，歐洲統合似乎指日可待。當代歐洲此種「分」與「合」同時並進的特殊現象，更激起學界對國家塑造研究之熱潮。⁸

當前這一波國家理論與早期政治學對國家的研究雖都關注「國家」此一議題，但不論在範圍、架構、方法或是理論上，二者均頗有其差異，並具體表現在以下四點：1. 首先在討論議題上，早期政治學研究國家多侷限於國家構成、政府組織、主權性質等議題；而當前國家理論則擴及國家之符號作用、國家機關的演變與特徵、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國家在世界系統中的地位。2. 其次論及分析架構，早期政治學主要是從國家本身體制來分析相關現象，而當前國家理論除探討國家正式組織體制外，更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關係、歷史脈絡及環境條件等方面切入，即以「國家——社會」作為探討的主軸。3. 再就方法、理論而言，早期政治學研究國家多採法律與制度取向，故與公法及政治哲學關係最為密切；當前國家理論研究方法則不拘一格，但與結構主義、歷史社會學及政治經濟學較有關聯。4. 最後在問題意識方面，早期政治學的問題意識多環繞於國家的統治及其限度上；而當前國家理論則在說明國家如何建立、表現何種結構特徵，以及國家權力在社會經濟面的意義，其問題意識更具深度與廣度。⁹ 正因當前國家理論所呈現的多樣性，頗能吸引各學科眾多學者投身於國家理論的研究工作，並因其強調由歷史脈絡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關係，遂給予歷史學者很大的研究空間，¹⁰ 開拓了許多國

4 探討德國國家塑造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可參見 Abigail Green, *Fatherlands: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hood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Knopf, 1953)。

6 於是政治學界乃有「回到國家」(return to the State)的呼聲，詳見 G. A. Almond et al, "The Return to the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1988), pp. 853-901。

7 任德厚，《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1995，增訂 3 版），第 3 章「國家論與系統論」，頁 70。

8 有關蘇聯解體以後的國家塑造，可參見 Ian A. Bremmer and Ray Taras, *New States, New Politics: Building the Post-Soviet 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至於歐盟架構下新的國家塑造，可參見 Volker Bornschier, *State-Building in Europe: the Revital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任德厚，《政治學》，第 3 章「國家論與系統論」，頁 72。

10 除政治學者外，當前國家理論的研究成果有相當部分是來自於社會學者及歷史學者，由於取徑及關心角度與政治學者頗有不同，還引發政治學者對此問題的關切。參見任德厚，《政治學》第 3 章「國家論與系統論」，頁 73。

家理論新的研究成果。

前一波新國家理論的研究對象多集中於歐美（尤其是歐洲的國家塑造歷程）；但晚近西方學界對國家塑造議題的探討，則漸有由歐美轉向其他區域之趨勢。譬如 Pierre Du Toit 對南部非洲各國國家塑造與民主的論著；¹¹ Recep Boztemur 對土耳其近代國家塑造的研究皆是。¹² 而中國作為非西方社會的主要代表國家，再加上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對漢學及「中國研究」深厚的基礎，自然亦成為晚近新國家理論的重要研究對象。值得注意的是，最初西方學界運用新國家理論研究中國的國家塑造，主要是集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及其相關議題上。畢竟中共在 1949 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雖是移植蘇聯的歷史經驗，但在國家型態上確實是一全新之面貌，加以新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在在引發西方學者研究之興趣，並有較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是 1990 年出版，由 Joyce Kallgren 主編的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一書。¹³ 該書分從外交政策、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社會改變與中國的選擇等七個面向，剖析「新中國」建立四十年後，國家在各領域的發展狀況。此書的出版，代表西方學界在經歷 1989 年中國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六四血腥鎮壓的震撼後，對中國國家暴力及國家機器的一種全面的反思。

西方學者在研究當前中國國家塑造議題時，逐漸感覺問題有向前延伸之必要，尤其是針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此一階段。其原因正如 Robert Bedeski 所言，若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國家主權是脆弱的，僅只是形式的；

然而，同樣明顯的是 1949 年後，中共政權的國家主權卻是強大且實在的。這個重要且基本的（國家主權）改變如何發生？要回答此一問題，勢須重新檢視國民黨統治時期（1927-1949）的中國。¹⁴

三、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

關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國家發展，長期以來西方學界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一是突顯國民黨政權內在結構的缺陷，以解釋其在國共內戰時期「不可避免」的失敗，這方面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做出了重大貢獻。易氏認為，1949 年國民黨的失敗，其根源可追溯至 1920 年代的清黨；清黨的結果是將黨內一批最積極、最有活力的左傾年輕黨員清掃出去，此後國民黨的體質乃轉趨保守、腐化。加以國民黨始終無法克服其內在結構的根本缺陷，遂埋下敗亡的種子。¹⁵

另一研究取徑則是以較為同情的筆法，強調國民黨政權在面對當日內憂外患下，如何去克服諸般內在結構缺陷的奮鬥歷程，這部分則有楊格（Arthur Young）及薛光前幾部論述國民黨政權成就的專著。楊格強調，南京時期（1927-1937）中國政府在面對各種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際，猶能進行一系列財政、經濟的改革，並能達到一定的成果；在這些改革中，尤以法幣政策的實施最具成效，其不僅有助於中國的統一，亦奠定日後對日抗戰的基礎。¹⁶ 而薛光前所主編的兩部論文集，則說明了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政府的抗戰準備、統一成就等艱苦奮鬥的歷程。¹⁷

11 Pierre Du Toit, *State Building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Africa: Botswana, Zimbabwe, and South Afric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5).

12 Recep Boztemur, "State Making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urkey: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Ph. 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Utah, 1997.

13 Joyce K. Kallgren ed.,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4 Robert E. Bedeski, "China's Wartime State," in James C. Hsiung & Steven I. Levine ed.,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2), p. 34.

15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 Arthur Young,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1927-1937*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17 Paul K. T. Sih (薛光前) ed.,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7).

當然，過去西方學界研究國民黨政權的取徑一直是以前者為主流。不過，及至 1980 年代中期，受到了臺灣實施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政治民主化、自由化浪潮的影響，以及 1989 年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刺激，西方學術主流觀點開始對國民黨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其研究取徑逐漸由前者轉向後者，並對國民黨政權做出重新的、較正面的詮釋。¹⁸ 在此情形下，新觀點的研究著作帶來了對國民黨政權推動中國國家塑造新的視野。

譬如柯偉林 (William Kirby) 在探討國府時期的中德關係時，即對當時中國試圖透過模仿、學習德國，以達成國家塑造之目的著墨甚多，此亦造成 1930 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興盛。¹⁹ 而近期 Julia Strauss 在研究國府時期的國家塑造時，則採取一組相對觀念，即所謂的「強制度、弱政治」(Strong Institutions vs. Weak Politics) 做為分析架構，以論述中國國家塑造所須面對的內在結構缺陷。相對於早期易勞逸強調國民黨失敗的論著，Strauss 則發現國民黨的國家塑造竟是「令人驚訝地成功」(surprisingly successful)。²⁰ 凡此觀點，都促使西方新一代年輕學者重新思考中國國家塑造的相關問題。²¹

在近代國家興起的過程中，戰爭實扮演重大的角色，此已見諸許多相關著作。²² Micheal Mann 對「基礎行政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 的探討，也顯示戰爭與國家權力的產生之間有直接的關係。²³ 而 1960、70 年代

現代化理論盛極一時之際，亦有西方學者主張軍事現代化將可帶動其他領域現代化之說。這是因為現代軍隊所用之武器係建立在近代科學的基礎上，故使用武器的軍人須有基本學識素養；加以現代軍隊是以全國為範圍徵調招募士兵而成，故能打破地域界線及階級限制，並具有國家之意識。²⁴ 而在中國國家塑造的歷程中，戰爭的影響也是最大的。此不僅因為自 1840 年鴉片戰爭起，以迄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止，中國百年來戰爭不斷，甚至謂之「戰爭世紀」亦可；更在於武力是此階段制度全面崩潰下唯一有力之工具，其不僅影響政治的變動，並牽動一系列事物重大的發展。²⁵ 近百年中國所遭遇的戰爭中，不論就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傷亡之慘重、影響之深遠，以及與國家塑造關係之密切言，1931-1945 年的中日戰爭無疑是最重要的。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投身於中日戰爭之研究，其成果亦堪稱豐富，並在戰爭促使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加速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及有利中共的奪權等議題上達成重要的共識。然而，一直要到最近，西方學界才真正明瞭中日戰爭對中國深遠的影響：它不但帶給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根本的改變，讓中國資本主義更深入發展，並造成國家產業體系（國營企業）的興起。²⁶ 因此，下文將就臺灣及西方學界最近研究成果，進一步論述中日戰爭期間（1931-1945）「戰爭與中國國家塑造」的研究概況與觀點。

18 Julia C. Strauss,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7. 最近卞利男 (Morris L. Bian) 對西方學界的此種轉變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參見 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Jan., 2005), pp. 35-37.

19 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 Julia C. Strauss, *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c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4.

21 Julia C. Strauss,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p. 77, note 5.

22 Bruce D.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3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1-30.

24 J. J. Johnson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5.

25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65.

26 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pp. 35-36.

四、研究概況與觀點

中日戰爭長達十四年，並從各個層面徹底翻轉全中國，其影響極為深遠，故而學界對中日戰爭與中國國家塑造的論述亦呈現較多元的現象。雖然如此，但其持論大抵仍有脈絡可循，本文試圖將其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體制變革

為了因應對日戰事的威脅，中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曾進行若干體制變革，諸如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國防最高會議（1939年後改稱「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建制、總動員委員會的籌組皆是。²⁷此外，在較低層級的制度變革方面，還有中央設計局、黨政考核委員會的成立，以及行政三聯制的建立等。²⁸但在戰時體制中，最重要的還是軍事委員會及委員長侍從室的成立。軍事委員會早於1925年即已成立，原為國民政府轄下主管軍事之機構，採委員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中正辭卸國民政府主席一職，旋因次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上海之役，蔣乃以軍事委員會委員身分復出，指揮戰局。未幾，蔣升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軍委會之體制漸由委員制轉為首長制。此後，蔣中正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分指導軍政之運行，並不斷擴充其組織，馴至外界多有視軍委會為中國之「第二政府」，如1932年11月，蔣於軍委會之下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網羅全國碩彥名流、學者專家三十餘人，負責調查研究全國各種資源狀況及國內外政治局勢，並據此提出相應計畫，以供政府參考，故

可視為蔣之智囊團。其後國防設計委員會於1935年改組為資源委員會，仍隸屬軍事委員會，並擴大其職權，由原先僅為一設計研究單位轉為主導中國重工業建設之機構，積極發展重工業，軍委會職權已擴及經濟建設事業，侵奪了原先實業部主管工業之權力。²⁹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決定全面抗戰，一度籌劃設立大本營，以做為戰時最高軍事指揮中心（日本政府於1937年11月即已成立大本營）。然而，蔣中正認為設立大本營即表示中國進入戰爭狀態，為突顯日軍對華之侵略，中國係應戰而不求戰，蔣決定不設大本營，而以軍事委員會替代之。為此，軍事委員會乃修定其組織法，明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肩負全部國防責任，擁有對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權，並指導全國民眾」。據此，軍委會遂擴充組織，下設八部，負責指導政策、重工業、輕工業、商業、國際關係、民防及作戰等事務。國民政府及行政院各部會仍然存在，但其大部分職責則為軍委會所接管，軍事委員會成為戰時中國實際政治中心。³⁰此外，軍委會還陸續別立若干機構，如參事室、國際問題研究所、技術研究所等，其中尤以參事室最為重要。參事室直屬軍委會委員長，為蔣重要幕僚機構之一，主要負責外交、宣傳問題的研究，旁及財經重大議題及政府管理問題，亦從事延攬人才、條陳方案的工作，至於參事人選則多來自於各領域專家學者。³¹但蔣中正能於兵馬倥傯之際依舊日理萬機，更重要的還是因為軍委會另一直轄於蔣、與參事室平行的幕僚機構——侍從室。³²

27 有關總動員委員會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姬田光義，〈抗戰時期、國民政府の國家總動員体制をめぐって——國家總動員法・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國民精神總動員を中心に〉，「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抽印本）」（臺北，2004），頁1-7。

28 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pp. 37-38. Bian 認為中央設計局等這些制度的創立是受美國公共行政理論的影響。

29 有關資源委員會的淵源、組織及發展，可參見鄭友揆、程麟蓀、張傳洪，〈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30 Lloyd E.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6-127.

31 徐保達，「王世杰與民國政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碩士論文，2002.6），第三章「參與外交決策」，頁63-68。王世杰曾長期擔任軍委會參事室主任（1938-1946），親與密笏。

32 張瑞德，〈無聲的號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抽印本）」（臺北，2001），頁1-23。

早於 1932 年蔣中正駐節南昌、督導江西剿共時期，侍從室即已成立，係隨侍蔣身邊的重要幕僚機構，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從室初期組織較簡單，僅有一批隨蔣奔走各地的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以便及時為蔣處理各類函件公文。隨著蔣中正的地位日趨鞏固、權力逐漸膨脹，侍從室的組織亦日益擴大，內部人事也日臻完善。至 1940 年代，侍從室擴編為三個處及侍衛長四個系統，第一處主要負責軍事業務，第二處以處理黨政、外交、情報業務為主，第三處專管人事、考核業務，至於侍衛長則負責蔣的安全保衛工作。侍從室的組織系統中，尤以第二處工作最為重要，故由蔣氏心腹陳布雷長期擔任第二處主任。其後，伴隨著蔣集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職於一身，戰時中國一切重要事項之決策、審定，必先經由侍從室進行篩選並提供意見，侍從室甚至可以左右誰晉見蔣，何種情報得以上呈，成為蔣的超級幕僚機構。軍委會及侍從室的出現固然可視為蔣中正軍事專權進一步的擴大，但不可否認亦為中國政治、社會軍事化的結果。至此，蔣委員長成為中國抗戰的最高象徵，蔣個人幾乎與中國畫上等號，軍凌駕了黨與政，成為主導國家最重要的力量。

（二）戰爭動員

現代戰爭係總體戰，為有效進行戰爭，力抗強敵，中國政府勢必得凝聚全國人心，動員一切力量。在軍事

動員方面，南京時期中國政府推動國家統一運動已初具成效，地方割據勢力漸次削弱；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下，新式國防軍已見雛形；³³ 資源委員會「三年重工業建設計畫」的推動，亦厚實抗戰的國防準備。及至 1937 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因民族大義及「勝利第一，軍事第一」口號的激勵，中國政府不僅邀集向來各自為政的各地地方軍事當局來京召開國防會議，並議決全面對日抗戰。此後國府得以有效徵調地方軍隊投入抗日戰場，³⁴ 更大規模動員地方徵兵徵糧，³⁵ 進而將地方資源逐步納入國家體系中，³⁶ 中央權威大為提高，現代動員型國家的雛形開始出現，這是前所未見的。在政治動員方面，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府開始停止剿共，決定改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國共關係漸趨和解。為商議合作事宜，中共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奔走於京滬道上，並赴江西廬山與國府代表磋商，最後達成協議，中共於抗戰爆發後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其內容包含中共取消蘇區、紅軍接受改編及服從國府領導，國共再度攜手合作。為對抗日軍進攻並徹底解決中共問題，蔣曾構思將中共併入國民黨，以實行第二次聯俄容共，並派邵力子向周恩來試探。若中共對併入國民黨有所疑慮，蔣甚至有意取消國民黨，另立新黨，國民黨、中共及其他黨派均可參加此一新黨。1938 年蔣於國民黨之外別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其用意之一即是以之做為黨派合作的平臺；而中共雖極不願併入國民黨，但為表示對蔣之善意，亦曾允諾可加入三青團。³⁷ 國共關係的和

33 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經緯及對中國軍事改革的影響，可參見 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34 關於各省地方軍隊投身抗日戰爭的歷程，川軍可參見馬宣偉，《川軍出川抗戰紀事》（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滇軍可參見楊維真，〈滇軍與抗戰〉，《榮耀的詩篇：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國防部，2006.6）；桂軍則可參見朱宏源，〈廣西參與抗戰經緯〉，《現代中國軍事史評論》第 1 期（高雄：中山大學，1987.8）。

35 關於抗戰時期各省徵兵徵糧，可參見張力，〈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9），頁 497-518；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p. 45-70。

36 即以雲南為例，戰前雲南所盛產的錫礦完全由省政府控制，並透過出口換取大量外匯，雲南省主席龍雲即利用此外匯購置大批法式軍火，以維持滇省半獨立地位。及至抗戰爆發，中央決定統制滇省錫礦，蔣中正乃於 1938 年 10 月 5 日電龍雲，飭將錫產全數交由中央收購運美，以便接洽貨物借款。此後，雲南即喪失對滇錫的控制，並影響到雲南財政的獨立性。許卓山編，〈民國二十七年事略稿〉，《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 27 年 10 月 5 日記事，國史館藏。

37 楊維真，〈蔣中正對中日武漢會戰的佈局——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為中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集刊》8（2003.4）：338-339。

緩，自然對中國政府的戰爭動員助益良多。除此之外，擴大政治參與亦為政治動員另一要項。自西安事變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開始修正其一黨專政的理論，逐漸承認其他黨派的合理生存空間，政黨合作漸趨落實，自廬山談話會的召開、國防參議會的邀集，以迄國民參政會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是其顯著之成果。³⁸ 在社會動員方面，開戰後沿江、沿海省份工廠、民眾及大專院校的大舉內遷，譜成一頁史詩般壯闊的歷史。³⁹

但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軍隊在北戰場及東戰場的失利，東半部國土瞬即淪陷，國府失去其戰前的精華區，被迫退入控制力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區。加以蔣的中央軍經歷開戰之初的大量傷亡，實力銳減，已不復能有效控制地方，中央領導地位及權威乃遭受來自地方勢力的挑戰，國府甚至在許多方面都必須與地方勢力取得相當之妥協。緣此，戰前已日漸衰弱的地方勢力有轉而復甦之趨勢，對當日政局投下不穩定的因素。⁴⁰ 此外，自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後，國共關係亦由親密轉趨疏離，甚至當共軍大肆擴充敵後根據地並與留置敵後的政府軍爆發各式摩擦後，國共關係乃告急轉直下。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國共關係已瀕臨決裂邊緣。事實上，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因僻處西南一隅，在政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僅領導階層中的派系之爭越演越烈，即連中央與地方、國府與中共之間亦充斥爭奪資源之現象。⁴¹ 是以，如何面對地方勢力及中共的挑戰，成為考驗國府政治智慧的一大難題。

（三）國家認同

在國家塑造的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力量極為強大；其不僅決定國族的興衰，更滲透至社會各層面，深深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⁴² 中國民族主義有其兩重性，一方面是外燦的，即因應列強入侵，激發中國人強烈民族意識；另一方面是內塑的，透過民族精神教育培育國民愛國情操。中日戰爭期間是中國民族主義最昂揚時期，強敵入侵激起中國人同仇敵愾之心，學者即曾觀察到重慶民眾因應日機轟炸衍生出對日公憤及民眾互助的情況，頗有助於命運共同體的塑造，並加速近代國家觀念的普及。⁴³ 此外，中國政府當局更透過民族主義教育及對固有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從精神上武裝國人，並具體表現在下列幾點：1. 就國家象徵而言，國民政府於1940年4月明定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⁴⁴ 並將孫中山對黃埔軍校開學訓辭做為中華民國「國歌」，從而強力塑造中國民眾對國家的集體認同。2. 就學術著作而言，如錢穆撰《國史大綱》，極力強調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獨特性與悠久性，必可歷強敵而長存；錢氏並撰有〈戰後新世界〉一文，聲稱抗戰不僅是中國民族復興與傳統文化重光之契機，更對未來世界新文化的發展深具影響。⁴⁵ 雷海宗秉持「文化型態史觀」，認為抗戰是中國文化復興時期，在〈中國文化的兩週〉一文中，力言中國文化歷經魏晉動亂，竟能開創隋唐第二帝國，實為舉世未有之先例，中國文化或竟能開創第三週期亦未

38 學界有關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當為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39 有關開戰後中國沿江、沿海工廠內遷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為莊焜明，《林繼庸與戰時中國工業》（嘉義：明東出版社，1996）。

40 有關戰時中國地方勢力的研究，雲南方面可參見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頁151-213。四川方面見楊維真，〈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組風潮始末〉，《國史館學術集刊》4（2004.9）：101-134。

41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pp. 141-143.

42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3 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269-272。

44 國民政府秘書處編，《國民政府公報》14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影印出版），民國29年4月1日記事。

45 錢穆，〈戰後新世界〉（1943），轉引自王楙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論中國的復興〉，《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1291-1292。

可知。⁴⁶ 3. 就文藝創作而言，當日爲了動員民眾投身抗戰大業，亟需大量能夠鼓動人心、激發抗敵意志的通俗性宣傳作品；因此，團結全國文藝作家共赴國難，達成筆桿報國實有其必要。爲此，軍事委員會乃於1938年2月成立政治部，並由左派文人郭沫若出任其下第三廳廳長，掌理宣傳等事宜。隨後在官方的支持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組織相繼成立，大量通俗性文藝創作亦紛紛湧現，不僅激發國人抗敵意志，亦帶來大眾文化的普遍流行。⁴⁷ 4. 就民族祭典而言，1938年國府首度於陝西舉行全國各界聯合祭黃陵大典，視黃帝爲中華民族始祖。其實自晚清革命始，黃帝已被建構爲漢人民族主義之象徵，而成爲對抗異族的利器；此刻更被官方尊爲中華民族之始祖，以與日本入侵者進行民族聖戰。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舉行祭成吉思汗陵，以抵抗日人分離滿、蒙之企圖，體現五族共和，塑造中國爲一多民族之國家。這些作爲不僅支撐艱鉅的抗戰，同時亦營造對國家認同的共識。其中尤以調整國內民族關係，影響最爲深遠。

蓋自晚清革命黨人發動革命以來，受排滿革命風潮影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說甚囂塵上，寢假演爲「大漢族主義」，對國內民族關係衝擊甚大。因此，當清廷被推翻後，滿、蒙等少數民族人士乃長期對漢人主控的民國政府離心離德；加以日人從明治維新時期實行大陸政策以來，即積極推動滿蒙分離運動，1932年滿洲國的成立即是結合滿人對漢人中央政權長期之不滿及日人的強力主導而成。日人並於新成立的滿洲國內高唱日、

滿、漢、蒙、朝鮮五族共和，並繼續勾串內蒙古德王，推動內蒙古自治運動，意圖割裂中國各民族關係，以達其長期宰制中國之企圖。有鑑於此，1934年3月蔣中正正在闡釋「攘外安內」政策時就特別強調，安內政策要項之一即爲以民族平等爲原則，組織漢、滿、蒙、回、藏五族聯邦制度，並準備於十年內在滿洲、蒙古、西藏等地進行「自治試驗」，以免在列強進逼下盡失邊疆。⁴⁸ 於是中國政府開始調整民族政策，以各民族平等爲原則，朝多民族聯邦制方向思考，此不僅強化各少數民族對中國國家認同之觀念，亦可對當前處理中國統一與分裂問題提供重要的線索。⁴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戰時以民族主義動員民眾，卻亦可能造成其戰後的困境。此緣於戰爭期間經民族主義強大力量的動員，民眾不僅深覺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形成所謂「命運共同體」，亦對政治參與產生前所未有的動力。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很快就面臨了民眾要求擁有政治參與權力，並對國府當局形成開放政權的重大壓力；中共乃透過「聯合政府」、「政治協商」等擴大民眾權利之主張，爭取了政治的主動權。⁵⁰

（四）社會整合

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各區域人文、自然條件差異甚大，社會整合不易，國民一體共識難存。即以近代中國爲例，東南沿海一帶先是延續明清以來發展之趨勢，其人文及經濟發展已然與內陸各省有相當之差距；及至西力東漸，尤其是鴉片戰後開港通商更加大此

46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

47 中國文藝作家積極投身抗戰事業，可以老舍爲代表，見關紀新，《老舍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285-313。關於戰爭與大眾文化的發展，可參見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與“The Politics of Songs,” *Modern Asian Studies*, 30:4 (1996), pp. 901-930。

48 《蔣中正總統檔案·圖書文物·事略稿本》，民國23年3月7日記事。另見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訂（1933-1935）〉，《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334。

49 當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民族政策的歷史思考，可以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論爲代表，氏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日本學者對費孝通之持論並不表贊同，其批評可參見坂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東京：岩波書店，2004）。

50 佐藤公彦，〈近代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変容と蒋介石——清末義和団から國民革命期へ〉，「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抽印本）」（臺北，2004），頁15。

種落差。近代中國工商業及各式新事業、新機構（如大學、銀行、報社等）多集中沿江、沿海各大城市，譬如1937年上海即佔全國工廠數的30%，其他沿海各省佔51%，內地各省全部合計不過佔19%，顯見中國工業分布之不均。⁵¹至於其他新事業，亦大多類此；中國內地與沿海，幾乎分割為兩個不同的世界，此當然不利於社會的整合。然而當中日戰事爆發後，東半部國土瞬即淪陷，中國政府內遷西南、西北一帶，大批逃難人潮紛紛湧入，為數高達上千萬人。⁵²在這些新移民中，據估計主要來自沿海各大都市、較長久性的移民約三百五十萬人，他們大多屬於中產以上、擁有知識的社會階層，這些移民進入西南、西北後，為原先民風較保守、建設較落後的西半部地區帶來了人才、資金、技術、知識與新的觀念，成為戰時開發大西部的重要憑藉。⁵³此外，由於政府機關、學校、工廠亦大量遷移，加上對日戰爭的需求，中國政府頗致力於產業的建設、交通的興修及礦產的開採；⁵⁴結果不僅開發了西南、西北，民眾亦因接觸頻繁而逐漸消弭省籍觀念，社會漸趨整合，頗有利於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不過，在當日資源有限情況下，外來移民與本地人士因政治參與及工作權等等而引發的紛爭，仍不易尋得解決。⁵⁵

五、未來展望

綜前所述，「戰爭與國家塑造」課題雖在「中國研

究」中仍屬新興議題，然目前發展已取得較豐碩之成果，其立論觀點亦有許多重要突破，此亦足見戰爭與中國國家塑造關係之密切。惟此課題畢竟發展時間較短，學術上仍頗有其不足之處；展望未來，似可於下述三方面再求精進：

（一）加強地區比較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塑造並非孤立現象，應將其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加以探討。以中日戰爭為例，其衝擊即不侷限於中國，而係擴及日本、滿洲、朝鮮，甚至整個東亞。因此，就戰爭與國家塑造而言，若能將其他地區的國家塑造與中國作一比較，或能有更重大的發現。而1932年成立的滿洲國，就有最佳的比較基礎點。這一方面是因為滿洲國的出現與覆亡（1932-1945）恰與中日戰爭相始終；另一方面則因近幾年西方學界對滿洲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之故。⁵⁶譬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對滿洲國的研究觀點，就頗令人印象深刻。杜贊奇向來致力於解構國族主義，要「解救」（rescuing）被各國國族主義壓制的歷史。⁵⁷他認為20世紀的國族主義總是為虎作倀，經常成為「國家」對外侵略或對內壓迫的藉口。因此當他發現滿洲國的建國理想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相互尊重原則下，對滿洲國同情之心就油然而生。杜氏認為，中日兩國各自根據其想像界定國族主義內容，中國強調清朝領土範圍，故大力向邊疆伸張國權，為少數民族帶來災害；而日本則為追求生存空

51 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北京：三聯書局，1957），頁98-99。

52 關於戰時中國社會的研究，可參見 Joseph W. Esherick, "War and 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1940s,"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1 (1996), pp. 1-37。

53 Lloyd E.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133.

54 學者認為抗日戰爭促使中國國營企業體系的興起，可參見 Morris L. Bia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Dadukou Iron and Steel Works, 1938-1945," *Enterprise & Society*, 3:1 (2002), pp. 80-123。

55 Lloyd E.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 133.

56 近幾年西方學界對滿洲國的研究成果，可參見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ess, 2003); Yoshifumi Nakai,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 1931-1936,"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57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間而向外擴張，雙方其實都不容許滿洲獨立建國，故滿洲國是中日兩國國族主義下的犧牲者。⁵⁸ 經比較中國與滿洲國國家塑造之歷程，杜贊奇諸如此類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當能刺激學者對戰爭與國家塑造相關議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二）深化研究議題

國家塑造過程牽涉層面甚廣，但其最引人矚目的要點之一當屬民族（國族）主義（或國家認同）的作用。過去學界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多半持正面的態度，但民族主義其實是一把雙面的利刃，既能傷人，亦可自傷，杜贊奇對此已有深入探討。近年來西方學界對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再論定蔚為風潮，這方面 Pamela Kyle Crossley 的著作影響最大。Crossley 認為所謂的「漢化」（sinicization）及漢政權向邊疆的擴張，實乃一種帝國主義的表現方式。⁵⁹ 受 Crossley 的影響，Pat Giersch 在論述近代前期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變遷時，就透過一個邊疆漢人的個案研究，說明在近代前期，中國國家認同與邊疆國界的概念是不存在的。⁶⁰ 近年來 Crossley 將其研究重心擴展至東亞民族主義與「公義」（justice）的關係上，認為公義的泉源來自於國家定位（national definition）與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以致東亞公義不張；Crossley 透過對韓國三一運動及中國五四運動的分析，說明東亞某些地區民族主義的到來晚於公義，故無法及

時扮演抵抗不公義的角色。⁶¹ 此種論斷對中國傳統說法是一大挑戰，值得學界繼續深入探討。

（三）擴展研究領域

國家塑造原本是政治學國家理論議題之一，但晚近隨著新國家理論向社會、歷史、文化、心理等領域的發展，吸引其他學科眾多學者投身國家塑造相關議題之研究，不僅豐富了研究成果，且因不同學科內涵而形成多元價值與觀點。如若說歷史係包含過去人類一切活動之總和，則跨學科的研究——即與其他學科對話、擴展研究領域，實有必要，法國年鑑學派已為學界做出重要貢獻。當代臺灣學者張瑞德探討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大轟炸下重慶民眾的心理反應，注意到經過長時期的轟炸，重慶民眾漸由恐懼、焦慮、憤怒，轉為逆來順受；並尋求宗教（如果報、劫難等觀念）及迷信（如算命、風水、碟仙）等方式的慰藉。⁶² 此種歷史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對開拓新的研究議題顯有助益。然而，當前國家塑造研究成果雖亦注意到其他領域的發展，但主要還是從政治角度切入，對於新國家理論特別強調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探討著墨較少，這是可待繼續加強的。

「戰爭與中國國家塑造」是一較新的研究課題，晚近西方及臺灣學界對此專題投入頗為積極，亦有不錯的研究成果，但畢竟因學術開發較晚，各議題尚有甚大的探討空間，深值進一步繼續發展。

58 見陳永發、沙培德（Peter Zarrow）對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一書的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4（2004.6）：177-194。

59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d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4.

60 C. Pat Giersch,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8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 (Feb., 2001), pp. 67-94. 此漢人後來到了緬甸，娶了當地女子，加入緬甸軍隊，並與漢人為主體的清朝軍隊作戰而被俘。

61 Pamela Kyle Crossley, "Nation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ustice in East A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 245-309。

62 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頁 262-274。